

社会科学研究生教材

当代中国 政治经济学

沈开艳 陈建华 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沈开艳 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 沈开艳等著. —上海: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20-2475-3

I. ①当… II. ①沈… III. ①政治经济学—
研究—中国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5863 号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著 者: 沈开艳 陈建华 等

责任编辑: 应韶荃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龙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35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475-3/F·550 定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1
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业绩呼唤政治经济学解释	1
二、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就与问题	4
三、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实践的滞后性	6
第二节 什么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7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7
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8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	10
第三节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11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11
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14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与框架	16
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有待深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18
第二章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22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22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中国人民的选择	2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24
第二节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	28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构建	29
二、从生产力研究到科学发展理论的探索	31
三、从商品生产到市场经济理论的争鸣	34
第三节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37
一、从基本制度到前沿理论的创新	37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	41

第三章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依据	45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45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45
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原则	48
第二节 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演进	49
一、社会主义改造与公有制体制的确立	50
二、经济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制度的充实	51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53
第三节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	54
一、经济“新常态”下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	54
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与总布局	56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60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60
一、政府和市场：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	60
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视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推演	61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历程	65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四个阶段	65
二、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总体评价	67
第三节 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现实问题及改进	68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改革阻力	68
二、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70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与企业关系	73
第一节 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理论考察	73
一、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本界定	73
二、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理论积淀	75
第二节 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改革进程及评价	77
一、改革历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回顾	77
二、政府与企业关系变革的总体评价	79
第三节 新型政府和企业关系的调整与构建	80
一、新型政企关系的构建原则	80
二、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政企关系的再演化	80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产权关系	83
第一节 产权关系的基础理论与改革特点	83

一、所有制理论及产权理论的内容及评析	83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产权改革的特点	85
第二节 中国产权关系改革的历史进程	86
一、1949—1978 年：逐步全面推行公有制	87
二、1978—1988 年：放开个体和私营经济	87
三、1988—1997 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	88
四、1997 年至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推进产权改革	89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关系的改革方向	90
一、以产权明晰促进“效率优先”	90
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确保“兼顾公平”	91
三、坚定推进发展混合所有制	92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土地关系	94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土地关系的主要形态及评析	94
一、土地改革和合作社时期的土地农户所有	94
二、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	95
三、对于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关系的反思	95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关系的调整及瓶颈	96
一、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产权初步明晰	96
二、土地转让权界定不清造成发展瓶颈	97
三、农地确权和流通成为新一轮改革重点	98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城市土地关系的调整及展望	101
一、土地流通市场确立的历史进程	101
二、土地财政兴起及引发的系列问题	102
三、城市土地关系调整的分析与展望	103
第八章 产业政策视角下的产业结构关系（上）	105
第一节 马克思和其他经济学家的产业结构理论	105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业结构理论	105
二、其他产业结构相关理论与存在的不足	107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关系的基本矛盾	108
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背景与特征	108
二、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两种路径选择	110
第三节 计划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关系的探索	110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产业结构的国内外环境	111
二、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为核心的理论研讨	111

三、倾斜重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114
四、该时期产业结构关系的特点与绩效	116
第九章 产业政策视角下的产业结构关系（下）	119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产业结构关系政策的调整	119
一、产业政策研究的广泛兴起	119
二、有关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研讨	120
三、我国产业政策的历史阶段及主要内容	123
四、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关系的特征与评价	126
第二节 新常态下产业政策的重新审视与思想争鸣	127
一、争鸣展开的基础：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升级	127
二、力主市场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的学术观点	128
三、支持政府选择发挥适当作用的学术观点	130
四、对比与评析	131
第三节 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总结与深化	132
一、产业结构关系的规律总结	132
二、未来产业政策与结构关系调整的要点	133
第十章 中国特色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	134
第一节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变迁的理论分析	134
一、中国特色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概念及其特征	134
二、经济体制转型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	136
三、正确处理中国特色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矛盾关系	137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及其评价	139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性分权”	139
二、“行政性”分权结果与市场经济的耦合	140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塑	142
四、“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关系	144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定位	145
一、新常态下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时代要求	146
二、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调整	148
三、未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进一步合理调整	152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155
第一节 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155
一、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内涵	155

二、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辩证关系	156
三、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践探索	157
第二节 收入分配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158
一、初次分配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158
二、再分配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160
第三节 当代中国公平与效率关系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	163
一、城乡二元经济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影响	163
二、政府行政性垄断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影响	164
三、市场化改革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影响	165
第四节 当代中国公平与效率目标的确立和实现	168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本质	168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目标	168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协调实现	169
第十二章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	172
第一节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172
一、区域协调理论的理论基础	172
二、马克思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主要内涵	173
第二节 中国区域经济关系的演进逻辑	174
一、中国区域经济关系的变迁	174
二、中国区域经济关系的战略设计	178
第三节 当代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	181
一、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	182
二、区域关系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	182
三、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态势	184
第四节 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与协调	185
一、中国城乡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85
二、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	186
三、中国城乡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188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协同关系研究	189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资关系的理论分析	189
一、劳资关系研究的多重理论视角	189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	192
第二节 新中国劳资关系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193
一、新中国劳资关系演变的四个阶段	19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资关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5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资关系的现实问题及解决路径	198
一、影响劳资合作共赢关系的问题与障碍	198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合作机制的完善	200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劳动-技术”和谐关系	201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203
第一节 增长与发展的理论分析	203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	203
二、增长向发展转变的理论研究	204
第二节 中国经济建设战略从增长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206
一、改革开放“粗放型”经济增长路径	206
二、“经济建设新路子”渐进探索	206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基本形成	207
四、“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08
五、“新发展理念”重新认识经济发展规律	209
第三节 新时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探索	210
一、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挑战	210
二、经济新常态对完善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要求	211
三、“新发展理念”对中国发展战略的统领指导	212
第十五章 促进内外均衡的对外经济开放关系研究	216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溯源与实践	216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外经济开放思想	216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外经济开放思想的发展	217
三、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	218
第二节 我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历程与成就	218
一、我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历程	218
二、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221
三、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成就	222
四、我国对外经济开放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223
第三节 进一步构建内外均衡的对外经济开放体系	225
一、形成对外经济竞争新优势	225
二、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225
三、构建内外均衡的对外贸易新体系	226
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227

第十六章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逻辑与创新发展	229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逻辑	229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实践逻辑	229
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理论逻辑	231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32
一、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错位——行政性垄断和市场性垄断	232
二、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重新定位与耦合互动	236
第三节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239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39
二、做出经济新常态判断，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241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改革开放新发展	243
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52

第一章 导 论

构建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在经济领域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的新境界开拓，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总结和提炼，赋予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全新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另一方面是在对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全新探索，但同时作为政治经济学又大胆吸收了西方经济理论合理阐述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内核。从而，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建立起海纳百川、博采各家之长的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业绩呼唤政治经济学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来，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发展的 30 多年来，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取得了不小成就，比较好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等问题。同时，近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仅对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实行以全面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判断提出一定疑问和挑战，也突破了诞生发展于 200 多年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历史背景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时代性和地域性上的局限。这些经验和理论积累需要深入总结并提炼，而这些理论的渊源来自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包括：

一是探索出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前 30 年形成的发展模式，认识到须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并举的“双轮驱动”，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各自职能和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因时、因地、因事而随时调整的，从而可以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从而引导中国

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二是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实现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195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679 亿元，2017 年突破 80 万亿元；其中 1979—2017 年年均实际增长 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 3 倍多；GDP 排名从 1978 年全球第 10 位跃升至目前第 2 位；国家财政收入从 1950 年的 62 亿元上升到 2016 年的 17 万亿元；外汇储备由短缺到迅猛增长，从 2006 年起连续稳居世界第一位。

三是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1950—2017 年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14.0%，出口额年均增长 14.2%，进口额年均增长 13.9%。进出口贸易总额在 2009 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引进外资方面，我国从 1993 年起一直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方面，从无到有，从 2003 年的 29 亿美元到 2014 年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再到 2015 年超过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四是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 7 亿。从 1978 年到 2017 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7 亿多，年均减贫人口规模 1 945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 90.3%，贫困人口年均减少 6.4%。进入 21 世纪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3.9 亿，贫困发生率下降 42.6 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年均减少 9.7%。

五是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举世瞩目。1949 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 10.64%，2017 年提高到 58.52%，年均提高 1 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城镇化的平均水平；城镇人口由 1978 年的 1.72 亿增长到 2017 年的 8.13 亿，年均增长 1 700 万人左右。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也带来了第三产业在 GDP 中比重的不断提高。

六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实力不断壮大。2010 年，我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原煤产量由 1949 年的 0.32 亿吨增加到 2017 年的 34.45 亿吨；原油产量由 12 万吨增加到 1.92 亿吨；发电量由 43 亿千瓦小时增加到 62 758 亿千瓦小时；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7 万千米，比 1949 年增长 4.4 倍；公路里程达到 477.35 万千米，增长 58 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15 年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13.65 万千米，居世界第二位；港口吞吐量连续十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成就辉煌的同时，中国经济建设中仍旧存在诸多具有自身特色的重大问题，急需在理论方面不断进行突破，唯此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这一系列问题包括：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特有的重大问题之一，包括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产权不明晰、企业独立性不强、非合理占用社会资源；经营不善、负债率高；微观经营效率低下、激励机制不合理；滞后市场化改革等。

二是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问题。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不同于发达国家产业自然发育的过程特征，而经历人为的规划、部署、参与，国家意图是希望产业在有限资源约束下更好更快地发展。以往该问题主要集中在“工业化”方面，现在又伴随有服务业、信息化、新型工业化，以及产业协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统称为产业发展问题。

三是土地问题。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体制机制与经济发展阶段、与普通群众工资收入水平脱节严重，价格形成机制畸形。房地产正常消费品功能与自主改善功能被畸形压缩，而房产的投资品与投机功能被不合理政策与有缺陷的政绩考核体系畸形放大扭曲。房价带动地价过度上涨，对各行业协调发展和生产性投资带来不利。农村方面的土地流转效率低下、征用冲突、补偿滞后、产权不明晰；城市方面土地供给粗放、规划不合理、过于依赖土地财政、间接推动房价。

四是社会保障问题。分配不公，社会保障缺位，机会不平等而社会差距拉大，引发内需不足，增加人口红利丧失的隐患。同样，户籍制度也与分配和社会保障有密切关联。社保账户至今不能做实做足，短期有结余，长期看可能存在收不抵支的情况。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为解决国企脱困问题而设计的，无法应对国企改革后大量体制外就业、非正规就业、灵活创业就业的庞大国民群体的保障需求，更无法解决农民工群体的基本需求，社保缴纳与回报没有吸引力。同时，社保缴费由企业负责 20% 的规定还给本来艰难的民营企业加重了用人负担，起了遏制就业而非鼓励招工用人的错误导向。

五是政府职责边界不明问题。政府承担过多职责，包括救市、灾害管理、行业管理等；相较而言，社会治理较为缺位，缺乏公民社会、缺乏非政府组织、缺乏行业自律等情况也一直存在。

六是财税体制问题。分税制改革远未完成，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推进困难，地方经济与社会支出责任大而财力严重不对称不匹配；部委项目审批与资金拨付机制导致“跑部钱进”，政府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审批变成了“可批性审批”；非国有企业税负和居民消费税负较重，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融资和上市空间显得不足；税收体系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非生产性、非就业性激励，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内需的扭曲。

七是国进民退、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国内投资中政府与国有资本独大，民营经济被视作二等公民，很多民企和民间资本在市场准入、金融市场等都受到排挤，只能在非“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小打小闹”、附庸生存。“经济命脉”这一引进自列宁和前苏联计划经济的词汇，其思维模式至今依然控制左右着政府的决策思维，形成扭曲的国企独大市场 and 扭曲的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

八是城乡二元体制固化问题。虽然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皆以“三农”开头，大量惠农、补农的政策举措每年花费数千亿资金，但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定居、享受平等市民待遇依然受到体制政策的严重阻碍。现阶段的一些“三农”政策没有有效促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反而固化了小农生产方式，导致农民人均收益和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农业规模化集中经营、企业化、生态化发展受到体制阻碍。

以上问题，无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目前而言都未能有效提出较为系统的解释框架，不过也正是因尚未解决，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发展留下了一定的潜在理论空间和学术空间。

二、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就与问题

西方经济学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抑或是否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疑难都可凭借西方经济学而得到较好的解决?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经济理论在与中国经济现实的对接上往往存在不顺畅的情况。这种不匹配性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典型案例中。

第一,“中国崩溃论”的屡次提出与屡次破产。作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曾多次对中国经济发表过悲观言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成功预言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教授在其著名的《亚洲经济的奇迹》(*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中指出,中国虽然有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事实上自1964年以来,其在经济效率上的改善如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非常有限。换言之,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要素投入的追加实现的,而显然这种模式难以持续。该预言在中国成功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消沉,直到2001年,《中国经济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开始在西方世界蹿红。该书作者——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其经济将迎来崩溃,因为一方面,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堆积如山,此前的维系全凭中国民众省吃俭用,而在加入WTO、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民众将把存款放入利率更高的外资银行,国有银行倒闭将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中国在开放市场后,必将迎来巨大的贸易逆差,从此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下滑也将成为现实。随后,2002年《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主编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出版《中国梦》(*The China Dream: 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一书,该书的主要观点是,现在很多外资涌入中国市场是过于理想化的。因为中国人均经济产值较低,这和其拥有巨大外资额是不相称的,其次由于政府的保护和限制,外资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领域艰难发展,最终中国经济依靠大量投资(包括外资)推动的增长模式将会破裂,进而陷入危机。该类言论的第三次兴起是在2010年,以华尔街一些基金经理为代表的西方人士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泡沫过大,岌岌可危,中国经济面临崩溃。随后,越来越多的专家表示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依据包括:私营部门杠杆化加剧,社会信用危机、国有企业超高的资产负债率、利率增长放缓、出口竞争力减弱、就业增长停滞、人口红利丧失、房价持续上升等。总而言之,过去30年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便有基于不同依据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随后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现实面前归于沉寂。

第二,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的质疑。有较为系统测算的是美国学者托马斯·罗斯基(Tomas G. Rawski),他于2000年发表《中国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一文,认为中国1997—1999年间的政府公布GDP存在严重高估。其主要的一些论据有:首先,中国在这三年间的单位能源消耗量是下降的,而低能源消耗产业的发展速度不足以使其成为中国产业的主要形态,因此很难与此同时伴随着GDP的增长;其次,中国工业增长

10.75%，但与此同时在 94 个主要产业中有 53 个产业物质产出下降，同时中国在此期间还遭遇了重大自然灾害，逻辑上难以说通；而且中国的国内消费也未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即在此年间中国人口增长数量极微，且人均费用支出增速也不显著。因此，罗斯基根据能源消耗、失业水平、消费品价格以及航空业发展等方面的数据综合指出，1997—1999 年间中国经济至多增长了 2.2%，甚至有可能收缩了 2.2%，与中国官方公布的 7.8% 存在极大差距。因为这一言论存在很强冲击，因此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美国的《新闻周刊》《商业周刊》《中国经济评论》等纷纷对其进行了报道。同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也提出，在经济体制健全的香港的增长率都接近为零的情况下，中国何以实现 7.3% 的高增长，特别是，中国如何在一年内将通胀率从 10% 降到零？这些前后矛盾都反映出官方统计数据的不可信。瑟罗在 2007 年仍坚持声称，中国所提出的 10%—11% 的年平均增长率，是以占 70% 的、没有增长的农村经济为基础的，那么中国城市经济就必须达到 33% 的增长水平；同时，中国电力消费量和其经济增长间也存在矛盾，所以中国目前公布的 GDP 存在问题，也许会有一个“中国的世纪，但绝不是 21 世纪”。

第三，对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预测。随着中国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程度以及世界结构性经济危机中所持续显现出的稳定程度加深，一些西方人士开始放弃中国经济即将破败的极端言论，转称中国经济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No. 2》称，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由此西方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是否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探讨。例如 2013 年 2 月 3 日《今日美国报》指出，中国大搞城市化建设转变速度过于惊人，且对环境造成隐患，一旦搞砸，中国即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华盛顿邮报》在 2014 年 3 月 19 日称，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经济增长显然放缓、低于预期的工业产出和出口就是最新证据。同年，路透社研究称，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首次实际增速转为负值，即从 2001—2007 年的均值 3.3% 下滑至 2007—2012 年的 -0.9%，对中国可持续增长造成拖累，同时普通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回报减少，而能源、劳动力、土地、信贷等成本上升，这都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信号。

然而，以上种种崩溃言论或系统分析都没有应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良好，特别在加入 WTO 后显示出巨大活力，目前已向“新常态”开启平稳过渡。但是必须要说明，西方世界“中国崩溃论”的破产，不能作为西方经济学说不适合中国的直接依据。因为首先，此一系列言论有其自身的数据、逻辑和事实漏洞，连克鲁格曼都直言，自己关于中国的认识都是听说的，而反对崩溃论的观点在国内外也层出不穷，其并非本研究的重点，因而不作展开。其次，就“中国崩溃论”的主要观点来看，其套用的逻辑也并非全为西方经济理论，而大多是“西方经验”，如资产负债率水平、投资比重、行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等，其参照系统大多为西方国家呈现出的常识性事实案例，而并非经济理论体系；同时也要看到，很多严谨而资深的西方经济学者也发表

了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言论，如美国资深的中国经济研究者杜大伟（David Dodwell）、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甘思德（Scott Kennedy）、哈佛大学教授尼亚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等。再次，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在吸收西方经济学范式、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现实经济也形成了诸多颇有建树性的分析。

但是，“中国崩溃论”的破产，从理论与学术发展的角度也带来了一种思考，即西方世界认为中国的很多“不合常规”，反映出中国当前的现实经济发展很多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典型事件，因此在很多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上，难以实现快速、直接、精准的对接。当然，积极进行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化”是一条可行路径，但除此之外，在中国较为突出的这些重大经济问题上，是否还可建立其他理论范式，的确提供了巨大的可挖掘空间。

三、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实践的滞后性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因而政治经济学也就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政治经济学总是在适应一定历史时代的客观条件与发展要求基础上而产生、存在与发挥作用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适应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基本特征而产生、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内在科学性，在于它基于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实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也在于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都是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特征的反映。长久以来，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断进化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较为固守陈规，缺乏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适应新的时代特征而不断修正和创新发展的新理论诞生。

同样，以“苏联范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忽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发展与新特征、忽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存在着与现实脱节、落后于时代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它没有指导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有益成果与成功经验，没有指导国家根据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推进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于中国，在时代意识、问题意识、国情意识上均存在显而易见的局限性。从生产条件来看，当代社会经济已不是农业经济或传统工业经济，而是以信息化引领的后工业服务经济；从社会的生产形式来看，社会经济已不是自然经济、古典市场经济，也不是传统计划经济，而是以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宏观调控与社会保障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已不是以国有制为代表的传统公有制和以业主制为代表的古典私有制为主导，而是以股份

制为代表的社会化所有制为主导；从开放性来看，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已不是某一国家也不是某一地区的生产方式，而成为全球化、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从问题和国情上看，当前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下，增速换挡的预期仍不明朗，没有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

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求克服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与影响，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发展要求，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结论，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观点，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第二节 什么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为导向，紧紧扣住中国经济社会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以显著的中国意识与中国智慧，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作出新的系统阐释。基于以上指导思想，本书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拓展深化的资源配置关系，即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生产资料占有公有制（或共同占有）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市场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将以“资源占有的公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这一基本对立统一关系为逻辑主线，映射在现实经济运行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实践性的辩证关系，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

政府与市场关系——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二者非此即彼、相互对立，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则证明政府与市场可以互补；因此，从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中提炼出一套完整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

政府与企业关系——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时期，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直接反映，“政企分开”要求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新的模式，使政府和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都能找到最佳位置，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